

Deng Yan Da

● 谭元亨 李景秋 / 著

· 史海名流丛书 ·

□ 天津人民出版社

邓演达

· 民主革命的彗星 ·

MinZhuGeMingDeHuiXin



邓演达

● 民主革命的彗星

(津)新登字 001 号

邓演达

——民主革命的慧星

谭元亨 李景秋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3 插页 25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1-02221-0/K·284

定价：9.60 元



邓演达像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图为邓演达（右一）在国民党侦缉队特务的押送下戴着手铐走向囚车。

引 言

历史之子

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哪怕是伟人，其名声不曾经历过几起几落的。这连胜利者、成功者也不例外，更何况是一位失败者、一位事业蒙受巨大挫折乃至殉身的人呢？

明白这一道理，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只是近十多年来的事情。我们过去太拘泥于历史教科书上非此即彼，不革命便反革命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推断了，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之前。虽然我们古训中早已有“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之语，但在某个年代里，“有争议的人物”一词，是足以把一个人置于死地的。

众多的年轻人，也许已不知道“邓演达”这个名字了，包括笔者，如不是写过几部史传，也就同样对这个名字为之茫然。他去世之后多年，笔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时候已没多少人提他了，后来，更没人敢提他了。即便有人提起，亦冠以其“反共”以表明自身的革命。所以，在孩提的我，不是噤声不问，而是无心以问了。没料在海峡彼岸的书刊中，在我出国讲学之际，却不期然发现他也被冠以“谋反”、“叛逆”的罪名，且以“背叛革命危害民国”而予以了处死。

由此引起了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关注。

倒不是因为我在人妖颠倒的岁月里也被当作过“有争议的人物”对待，惺惺惜惺惺；而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确有太多

的历史之谜尚须后人去破译。荣辱、毁誉，竟不可盖棺论定。刘伯温留下一部《烧饼歌》，称上知八百年，下知八百年，殊不知，就连这短短的几十年间，这烧饼就不知道翻过来折过去有多少遭。就算我写下这部史传，也未必论定得了，因为这位史传传主，恐怕一百年后也还得再作论定。所以，在这20多万字中，笔者并不想当一位什么历史裁判员，历史自在人心，人心自有公断。我所能做到的是，能为历史揭开另一重帷幕，一重曾鲜为人知的帷幕，让后人在审视历史时，多一个参照系，也就不至于太偏狭、太片面。

能如此，笔者也就如愿了。

持这一观点，我所引用的伟人、名人对邓演达的评价，也就不至于被当作神圣不可移易的了，从而成为抑制不同声音的铁律——在评价历史人物之际，这应成为一条原则。

历史来不及为邓演达作出公证，他殉身之日，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中，东三省刚刚丢失，南方红色政权风雨飘摇……而作为历史的记载，每每又是瞩目于成功者，至于其怎么成功则在其次。恰如一位生前曾威震四海、死后却被掘墓焚尸的大人物所言：“历史从来是胜利者写的。”绝不会光顾失败的人，多少早早夭折的牺牲者在历史的记忆中也被牺牲了，没有花圈，更没有祭帐来书写他们为何而牺牲的。邓演达是死得太早了，纵然他已很有作为，可他本还可以更有作为的。

他觉悟得早，离去得太早。历史上不少先行者每每只配有鲜血昭示于后人的命运，而不曾让其施展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天妒其才！人间的先觉悟者，只能以生命宣示其之美丽。

但是，道德高尚、志气高远者的牺牲，决不会白费，如同寒夜的彗星，尚可划下一道璀璨的光弧，多少让人看清一段前面的道路，并不曾徒劳无功地燃尽。作为生不适时的志士，他们虽然败绩了、被杀害了，但在通向理想的征途上，他们已显示了自身重

大的意义。那么,不从实体、而从精神上看,他们的死更是辉煌的,从而“胜利”与“败绩”本身的意蕴,也就不可以那么简单地加以领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演达是死得其所,死得辉煌,他不曾失败。

当年,搞农民运动,他与毛泽东是至为亲密的同仁,毛泽东在延安时,屡屡提起他、赞扬他。在他蒙难 30 年后,还同周谷城先生说起:“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可见两人感情至深。后来,毛泽东在批阅《旧唐书》时,仍没忘邓演达,在提及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之后,便提到了邓演达,再加上杨虎城、闻一多,给以至高的评价:“以身殉志,不亦伟乎!”^①

毛泽东如此,同邓演达共事更久、自黄埔军校,至北伐武汉的周恩来,其评价就更为直接了:“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周恩来这“若”与“假如”本身就意味着,如果那样,一部中国革命史亦可能改写。他很看重邓演达,称“这人的品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②

这些评价,大都是政治上的,但有一点,均提到了邓演达的人格之高尚,证实了邓演达的人格力量。历史已经没有了“如果”,但是,一个被公认为人格高尚的人,他对历史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却用不着“如果”而是完全可以作出肯定的。过去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太过于看重“实然之则”而陷于历史实用主义,对人物的人格方面、道德方面,乃至至于个性气质、文化修

^① 转引自《瞭望》1991 年第 5 期,陈晋:《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②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6~167 页。

养……诸方面，均有所忽略，以致不少地方难以自圆其说了呢？

邓演达以其短暂的一生，不仅留下了丰伟的业绩，而且留下了不少思想材料，还留下了作为一个人的至贵品质之楷模。如今研究他的人，每每吃惊于他对个人独裁早早提出的警告，对社会主义亦应有市场的主张——凭此，推崇者甚至可视他为“先知”；但亦有人以他的死，证明“第三道路”之不通，“第三党”之异端——纵然他生前一直对别人称其为“第三党”表示极大的反感，拒绝这一称呼……当然，说他“反共”或者“危害民国”这样极端的评价，已不再有多少市场了，历史本身已以事实而不以言语纠正了这一不公正。但真正认识邓演达这个人，却并非易事，不是靠找到几位权威的言论便可以大功告成了。

例如，他是农民运动的身体力行的主张者、领导者，与毛泽东有过亲密的合作，可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分明是农民运动政治的最高手段，他却又不理解，甚至说成是“流寇主义”——这恐怕不仅仅是在莫斯科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虽然共产国际也用过这个词。同样，作为黄埔军校的领导者之一、北伐骁将且在武汉方面亦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的他，在革命的重要关头，须他率军力挽狂澜，他却一口回绝：“我才把老虎皮脱掉，又要披上吗？”这又是怎样的思想在主导——虽然在几年后，他又重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要用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至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遂导致他悲壮就义。

……

凡此种种，都不可以以简单的“矛盾的统一体”来概括的。

邓演达是邓演达。他是中国 20 世纪一个特别的存在，他引起人们对现代命运一种独特的、深沉的思考，也为中国历史进程树立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统。他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所做的

贡献不仅仅是政治的、军事的人所共知的光辉业绩。他的历史遗产，永远是一个闪光的宝库，而这，也不仅仅是人格的、道德上的力量所在。认识他，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尤其是五千年来金光闪闪或锈迹斑驳的文化传统。没有忘却的，也许本该忘却；而忘却了的，却也许该牢牢铭刻在心——对邓演达，我们该如是说。

邓演达是历史之子，光从他是客家人这一点来说，他更是历史苦难的儿子。这是一个备受千年迁徙之苦的民系，一个气性很高、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原汉民族正宗后裔的民系，关于这点，我们后边将详尽谈及。他们带有中华民族古老的心态来到了沿海地带，后到为“客”，只得屈居于深山野岭或荒郊，却又受到西风日渐的民主、科学思想最早的影响。他毫无畏惧地迎接所面临的死亡，正是中国儒家传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杀身以成仁”精神之体现，故宋庆龄曾说过，他是一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会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对之不屑一顾。”^①但是，邓演达对作为儒家文化的负面“士大夫意识”却有着猛烈的批判，指出这一意识“主要的是礼教和名份。因此，我们要断定，中国的政治组织，实际上还是变形的封建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下，“广大的平民大众，真是到了求死不得的地步，那里说得上什么‘民主’与‘民权’！”因此，他的人权观比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更具有进步意义，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换句话说，离开了中国的国情、独特的历史背景，我们是以无以正确评价这位“历史之子”的。

在他献身之后，已经过 60 多年的风风雨雨了，现在，才由我

^① 宋庆龄：《纪念邓演达》，香港《华商报》1941 年 11 月 28 日。

们后辈来给他立传，才来重新认识他的价值，他的伟大，这本身已经让人深深地品味到历史的悲凉了。但这也说明，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一种权势，可以泯灭得了历史的良知。良知是永恒的，权势却很短命，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良知总会要复苏的，因为它不会死亡，这正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保证。邓演达就义时，我想，他也是这么想的，否则，就不会那般义无反顾。

为此，我们也该义无反顾地为他写下这一部传记，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亡灵。他已经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付出的呢？谨记取思想家顾炎武《精卫》一诗：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大概，这便是著此传的初衷。

草毕，闻在穗发现邓演达一墓，甚奇，因他殒身于南京，且见于郭沫若文中：

择生（作者注：即邓演达字）的墓在南京郊外汤山公路旁的一片荒丘上。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到南京时曾经去凭吊过一次。尔来又十年了，听说墓碑依然无恙。^①

总不至于此碑骤然飞回南国吧？

不过，我却知道，思念他的人，哪怕半个多世纪之后，仍会不少。凭此，多一墓碑亦不是奇事。

此书不亦为一碑文么？

① 郭沫若：《纪念邓择生先生》，《中华论坛》1946年2卷7、8期合刊。

目 录

引言 历史之子.....	(1)
--------------	-----

一、 童年	(1)
-------------	-----

1. 客家人的血脉	(1)
2. 邓氏：南阳望族	(4)
3. 七女湖的枪声	(9)
4. 淬火	(17)

二、 预习的年代.....	(25)
---------------	------

1. 中国这一部大书	(25)
2. 桂林大本营之行	(30)
3. 恩师邓铿被刺	(41)
4. “地下活动”	(45)
5. 临危不乱	(53)
6. 屡创奇勋	(61)
7. 智取冯葆初	(71)
8. 东江血战	(76)
9. 告别军旅	(84)
10. 黄埔风云	(87)

三、“太宗纵囚”.....	(95)
---------------	------

1. 俄械事件	(95)
2. 相聚在柏林	(103)

3. 归心似箭	(107)
四、 北伐悲歌	(112)
1. 重返军校	(112)
2. “中山舰事件”中的“主犯”	(121)
3. 山重水复	(127)
4. 临危受命	(142)
5. 胜利声中的忧思	(152)
6. 独闯租界:历史性的第一步	(161)
7. 双重的牺牲	(167)
8. 眼前,公然又是一个新军阀	(171)
9. 试金石:农民运动	(183)
10. “叫他蒋剃头”	(191)
11. 血战临颖——虽胜犹败	(194)
12. 无力回天	(202)
五、 心路历程	(215)
1. 莫斯科的严冬	(215)
2. 飞过高加索的宣言	(219)
3. 破万卷书	(224)
4. 行万里路	(230)
六、 功败垂成	(244)
1. 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244)
2. 平民革命思想的闪光	(248)
3. 军事部署	(257)
4. 喋血麒麟门	(266)
七、 历史群落	(277)
1. 严重:狂歌入万山	(279)
2. 黄琪翔:受命于危难中	(286)
3. 季方:“新村”奇想	(291)

4. 章伯钧：“政治设计院”之怪论	(293)
尾声 国殇	(299)
附录：邓演达年谱	(313)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326)

一、童年

1. 客家人的血脉

一千年走过来
再一千年走下去
过度的自尊
令心中的苦水更涩
太直的躯干
教人世的风雨更烈
万里长旌，你
铸下这历史的背影

这是一支写客家人的歌子，几欲概括了这个民系的历史、命运与品格。凭这一个大的概括，我们也不难看到邓演达隐约的背影……

邓演达是客家人，这个民系的文化因子，深深地渗透在他血液当中。一种文化背景，每每要大于意识形态、功利色彩等后天接收的观念，尤其到了关键时刻，它更为之凸现。例如国共两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让其聚合的，毕竟是超于一切之上的中华民族炎黄一脉的血统。也许对别的民族不可下这样的断语，但中华民族却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是别的民族所不可相比的。客家人既然视为汉民族的正宗，而且是最纯净的正脉，他们也就具

备有这种背景。

关于这个民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之际。美学大师宗白华曾就那个时代说下如下一段话：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凡是研究过客家民系形成及其特征的，不会没人不为这一段文字而拍案叫绝。客家人的命运，客家文化精神，几乎无一不与这一评述相通。先说命运，作为客家先民，魏晋时仍是中原汉人——这有客家语为证，今日之客家话，仍与开封附近的语言差不了多少。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而有能力南渡者，自然是衣冠士族居多，所以把中原深厚的文化传统，也带到了南方。南北朝之际，北朝武功，南朝文治，互为鲜明对比。

但客家先民，却由此开始了千年的大迁徙，由中原到建康（即今南京），后又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而后进入粤东，最后遍及南方十余省份。迄今，北至安徽、西至四川、南至海南、东至台湾，有统一语系及生活习俗的客家人有数千万之众。由于长期的浪迹，飘洋过海，足迹远至五大洲的客家人，也以千万计。因此，有人称他们为“中国的犹太人”，可从人数上计算，

他们较之世界上的犹太人，更多上不止一倍。而他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亦决不在犹太人之下。

这千年迁徙，风霜雨雪不说，战火离乱不说，千辛万苦，百口余一，挣扎到了南方，也只能为“客”，只余下残山剩水供他们休养生息。这些本是衣冠士族的中原人，每每以“郡望自矜”，却不得不下田劳作，甚至去干众人不屑干的卖艺、石雕、乃至于阉猪骗羊的勾当。在台湾，他们又被视为“原乡人”，大都是在江湖上游走卖艺，做小本生意的货郎担。意识与行为造成了极大的反差。所以，他们特重读书，依靠读书来重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是视为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哪怕倾家荡产，也得让儿子读上书，以一朝中举，鸡犬升天。他们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凡是有功名者，举族为其门前立一对石笔，巍然如华表，以志其光宗耀祖……他们总忘不了祖先在中原的荣耀。

也许，这是他们崇尚功名的一面，是命运所逼，是历史使然。

但是，他们也带来了魏晋南北朝的“罗曼司”。客家人待人的热情，是举世皆知的，上客家人地区，一进门不喝上三大碗，谁也脱不了身。这还在其次。客家山歌名扬四海，恐怕也是从魏晋时代流传下来的，文采风流堪为一绝，且也是男女自由恋爱，有情者终成眷属之手段，一反儒家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礼教的约束力几欲不存在。客家人中的文人学士，更是数不胜数，被列入古代十大诗人中最后一位，便是近代嘉应（即梅州）的黄遵宪，客家人。

这三言两语，无以概括客家人悲壮的迁徙史，更无以展示其“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命运，亦难以抒写这个民系众多强烈、鲜明的特征。

我们不妨选取“个案”加以论证好了。

这“个案”自然也就是邓演达。

如同客家人是历史地形成的一支独立卓行的民系一样，邓